

# “光绪废立”与《老残游记》： 重释刘鹗的救国理想与文体革新

郑学

**内容提要** 《老残游记》创作背景是刘鹗牵入“沈荃案”中，被误认为康梁党人，故此以文学形式为其同人团体发声。它被视为“谴责小说”，并看作“故事连缀”式的松散结构，实系一种误读。该书以“如何拯救中国”为核心主题，遵循“发现问题，在理论层面、实践层面解决问题”的逻辑结构展开情节，斯宾塞社会学理论是其思想基础。在小说观念上，刘鹗接受梁启超“新小说”运动的影响，同时试图在文体和思想上均达成“集大成”的姿态；即试图跨越雅俗，统合起“新小说”和传统小说的各个门类，尤其是“哲理科学小说”“侦探小说”和“狭邪小说”“侠义公案小说”。

**关键词** 《老残游记》；沈荃案；刘鹗；新小说

《老残游记》是中国近代最受关注的小说名著，诚如论者所云：“中国的三四代人，凡是在学校读过书的人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《老残游记》的。”<sup>[1]</sup>如此盛名之下，该书的创作动机、主题思想和篇章结构，却都存在若干未解的谜题：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处奇景。

自从鲁迅、胡适开辟小说研究的现代范式以来，《老残游记》就一向被视作结构、主题松散的“谴责小说”。然而《老残游记》与其他三大清末谴责小说，实有很大差异。因为本书虽也“借铁英号老残者之游行，而历记其言论闻见”<sup>[2]</sup>，但它隐含着严谨的逻辑结构，且能有意识地组合“实事”与虚构情节，共同构成统一的整体。

要之，刘鹗通过《老残游记》，对“如何拯救中国”这个时代难题做了完整思考，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方案。唯此一主题，只有在重新认识创作背景的基础上，方能充分揭示。

## 一 《老残游记》写作背后的 晚清政局

众所周知，《老残游记》对清末政事有所影射。

据刘鹗之子刘大绅追述，本书创作缘起与著名的“沈荃案”有关<sup>[3]</sup>。该案震惊中外，政治影响重大而深远，然其案情扑朔迷离，沈荃得罪和被逮的原因异说纷纭<sup>[4]</sup>；至于该案与《老残游记》的关系，当然更不得其详。实际上，“沈荃案”是以刘鹗为中心的洋务知识分子群体，在救国实践中遭受的一场重大挫折。由此带来的郁愤，促使他们产生向社会大众言说的愿望。而该案复杂的政治背景，让他们不得不选择含蓄委曲的小说文体。

换言之，《老残游记》的创作背景是刘鹗牵涉到“沈荃案”中，为此他以文学形式代表其同人团体发声，剖白政治主张，这构成了小说的主题。

### （一）以庚子事变为中心的创作背景

依据刘大绅《关于〈老残游记〉》中的说法，《老残游记》与晚清小说名作《邻女语》是一组兄弟作品：连梦青受“沈荃案”之累避难上海，租居于马建忠的房产，并撰写《邻女语》卖文救穷；刘鹗亦撰《老残游记》，以稿费资助连氏。虽然此说在细节上多有失真，例如蔡铁鹰考得连氏与沈荃案牵涉不深<sup>[5]</sup>，但《邻女语》的确与《老残游记》联系紧密：二者都有意对光绪庚子（1900）前后的几个重大历史事件表态。

沈荇原名沈克誠，号愚溪，1900年参与唐才常的“自立军”起义，因此受到缉捕，案发时为日本朝日新闻社驻北京记者（访事）。1903年五月，沈荇忽然被逮，七月结案定讞，刑部拟处斩立决，慈禧以适逢光绪生日，“万寿月内例不行刑”，乃亲自干预司法，“著即日立毙杖下”<sup>[6]</sup>。此案与上海章太炎、邹容之“苏报案”并称“南北二狱”，发生极大的国际影响，并深刻改变了晚清政局。

今日所见对沈荇案的详细描述，来自事件当事人之一，自号“芦中穷士”的王照多年后的追忆<sup>[7]</sup>。王照原系康、梁维新党骨干，在政坛十分活跃，戊戌政变后与梁启超一同流亡日本，而后很快放弃立场，求得清廷赦免。据王照记述，沈荇案发之际，王已由日本潜归，化名赵世铭在北京生活，常与沈荇往来。当时沈荇寄居刘鹗家中，同居者还有已革翰林检讨吴式钊，而吴热衷功名，卖友求荣，通过满族官员庆宽向清廷出卖沈荇，以换取自己复职。王照恐吴式钊出卖自己，遂向清廷自首。

依此看来，“沈荇案”近于刘鹗友人之间的一场内讧。但细读史料可以发现，案情并非如此简单，“吴式钊卖友”之事有违常理，颇为可疑。因为吴式钊昔年被革职的原因，不过是他企业活动中辞退了宰相徐桐的亲属刘某，为此开罪于徐<sup>[8]</sup>。而在1900年“庚子事变”之后，力主将他治罪的徐桐、刚毅均已死去，且有李鸿章亲自为他申辩：“衙门不知原委，辄加参革，迹近诬罔。”<sup>[9]</sup>换言之，吴式钊此时早已洗脱罪名，不难谋求“起复”，完全不必为此害死好友，自绝于士林。王照叙述的诸多细节难经推敲，史学界对此早有质疑，正如马忠文所说：“王照‘自首’背后的历史内涵远比已有文献提供的信息要丰富和耐人寻味。”<sup>[10]</sup>

关于本案，刘鹗显然曾对亲属做出过解释。但彼时其子年龄尚稚，刘鹗言之未必甚详，因此刘大绅《关于〈老残游记〉》记述的细节颇有淆乱，必待辨析之后方能采信。实际上，本事件的根源乃是1900年初的另一著名事件“经元善案”。

刘大绅说“沈荇案”的起因是“沈以事赴津，偶语方先生以中朝事，方先生登之报端，为清孝钦显皇后所知，大怒，严究泄漏者”<sup>[11]</sup>，其实是将沈荇与与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）弹劾刚毅、荣禄、

李莲英的翰林编修沈鹏混淆。沈鹏为常熟人，翁同龢同乡和门生，其事可以参见高阳《翁同龢传》。这个误会不难理解，因为两个事件主角都是沈姓文人，都和新闻媒体相关，又都涉及吴式钊一人，所以早在清末就有误会者，例如夏仁虎《旧京琐记》中的记载同样误植沈鹏事于沈荇<sup>[12]</sup>。

吴式钊在自传长诗《思痛吟》中，将自己褫职下狱的起因，浓缩为一组诗句：

截题发自大阿哥，公电飞传星架坡。已讶友邦挠内政，何堪商论振余波。

心疑煽惑有逋臣，十万空悬购缉文。一波未平一波起，莲珊风汉同宗旨。

……

此时天怒谁敢触，此时国闻与横议。沈郎摺稿谁传抄，借口正值刚牙利。<sup>[13]</sup>

省略号前一段指“经元善事件”，后一段指“沈鹏事件”，两事联系紧密。1900年初慈禧欲废光绪，先立端王载漪子溥儒为大阿哥预做准备，史称“己亥建储”。康有为领导的保皇会立即组织新加坡侨商通电干涉，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亦组织千余官绅通电，请总理衙门代奏收回建储成命。慈禧愤而密旨逮捕经元善，但经已逃往澳门。官员庆宽、刘学洵往澳门追捕，但由于总部设在澳门的保皇会全力营救，经元善最终得到殖民当局保护。

慈禧已经确认，这是与康有为有关、反对自己废黜光绪的一次政治事件。恰逢此时，光绪师傅翁同龢的门生沈鹏忽然弹劾荣禄、刚毅、李莲英。奏稿大谈李莲英离间慈禧、光绪，罪不容诛，请太后以保护皇上为第一要义云云，自然不能不让慈禧怀疑这是一起与经元善事件有关的活动。

沈鹏的奏折并未真正上奏，而天津《国闻报》窃得奏稿，加以报道，引爆这场危机——刘大绅所谓沈荇在天津《日日新闻》泄露政府秘闻，实乃此事的误记，所以研究者才一直无法确证被泄露的究竟是何秘闻——其实本来就没有。《日日新闻》系《国闻报》改名而来，加之“两沈”名氏相近，以致有此误会。被沈鹏弹劾的三人中，李莲英仅为内宠，荣禄展现出成熟的政治家风度，希望消泯危机，而刚毅则希望趁机兴起大狱。慈禧盛怒之下，接受刚毅主张，追究沈鹏同党。吴式钊为沈鹏同

年，又恰好开罪于徐桐，遂与沈鹏一同问罪。

以上事件，在当时虽然非常重大，但庚子事变之后，事过境迁，本已不足轻重，然而“沈荇案”的爆发却再次引起慈禧的紧张，因为案中又一次出现了吴式钊之名。

沈荇参加的唐才常“自立军”起义，或称“富有票”事件，本来就是保皇会支持下以保护光绪帝为旗号的举动，其时间与经元善案、沈鹏案相衔接。在慈禧看来，自立军的沈荇、沈鹏案的吴式钊居然同寓刘鹗家中，在北京潜伏甚久，显然是一件涉及光绪复辟的重大政治事件。在当时，这类政治案又不便明言，向来是以密旨处理——这可能就是“沈荇案”处处皆由慈禧密旨直接干预的原因。

虽然清廷讳莫如深，“沈荇案”与之前两案的联系还是不能完全掩盖。在“沈荇案”中，缉拿沈荇的官员是庆宽，本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，但他的形象出现却饶有意味。因为庆宽正是当年去往澳门缉捕经元善的负责人。可见在清廷方面，可能是把“沈荇案”当作经元善案的延续来办理。

既然牵入君王废立的大案，刘鹗亦难轻易脱身。他及时避地上海，免与沈荇同死；然而逮至1908年，还是受到清算。刘鹗被流放新疆的借口，乍闻至为荒谬。因为他在北京开展救援活动是李鸿章支持下的半官方行为，购买太仓粮食的事件虽然是刘鹗建议和主持，但也曾得到“东南济急善会”的其他官绅认可。当时刘鹗与陆树藩曾就此问题通信，刘鹗信中提到：

掩埋、平泉两事，原系阁下创议发端，故初办时禀合肥相国，已申明系阁下之意。<sup>[14]</sup>

换言之，这本非刘鹗的个人行为，事后却偏偏于他人有功、于刘鹗为过，断无此理<sup>[15]</sup>。因此阿英、汪叔子、吴振清诸氏，皆表示怀疑。然而此说发自刘鹗亲家罗振玉《五十日梦痕录》<sup>[16]</sup>，刘与罗至亲，很难想象罗振玉这样的通人，会在切身问题上犯低级错误。究其原因，还是刘鹗在庚子年的活动牵涉君位之争，又众所周知，罗振玉忠于清室，故不得不有所隐晦。

虽然刘鹗被遣是在1908年，但刘鹗日记与罗振玉的追述，都指明刘氏得罪，源于“庚子年”事<sup>[17]</sup>。盖刘鹗与沈荇同寓，正始于庚子年。当时

刘鹗在北京设置“瘞埋局”，“专掩埋无主尸骸，以沈愚溪主其事”<sup>[18]</sup>。执此方可理解，刘鹗获悉自己免职流放，竟向儿子刘大绅表示：“天恩高厚，喜出望外，然意外之风波，尚须防也。”<sup>[19]</sup>这不是封建时代君臣之间的套话，而是自知牵入君位之争，仅得流放处分，已可谓宽大。

同理亦可解释，1909年刘鹗致书姻亲甘肃巡抚毛庆蕃，认为可望赦免：“如执政仍是项城，则无望矣，幸南皮仁厚长者，可有赐环之望。且观于起用废员之诏，则摄政王之豁达大度，可见一斑，与南皮济美，或者鹗竟获生入玉门也乎。”<sup>[20]</sup>何以刘鹗如此乐观？盖因1908年底慈禧、光绪逝世以后，昔日皇权之争已然事过境迁，当政者有意缓和其与维新党的关系。当时社会舆论对此颇有反映，如《大公报》天津版1909年4月29日《要闻》栏目，就有“摄政王宽免公罪”的报道：

政府对于戊戌因公获咎人员，已逐渐施恩开复。闻均系摄政王一意主持，某相国虽多不悦，然亦莫可如何。现闻王意，仍拟斟酌所犯情形，次第开复，惟以事关大局，不便操切而行。<sup>[21]</sup>

此报道与刘鹗之信不谋而合，所谓“某相国”即刘鹗所提到的袁世凯。惜乎刘鹗于是年中风去世，未能等到“次第开复”的一天。

至于事件中的第三人吴式钊，此后下落成谜，异常神秘。按照清政府的官方口径，他以六部主事身份复官。但这个说法尚存疑点：吴式钊原本是清末最活跃的云南作家之一，著述颇多，但目前所见一切吴氏作品，都写于“沈荇案”之前，甚至其学术名著《六书纲目》在案前未能完成，乃就此竟成残帙。有传闻说“沈荇案”后吴式钊改名吴志郭，亦不详其改名原因<sup>[22]</sup>。据此揣想，吴式钊很可能经历了某种迫害或精神创伤，甚至生死不明，所以才产生这样奇怪的“失声”现象<sup>[23]</sup>。

要之，“沈荇案”的背景波诡云谲，此案中的文宣也颇为有趣。除革命党人趁机搅动舆论以外，本案妙在当事双方心照不宣，都不能揭破案件真正动机。对慈禧而言，她不得不忍受庚子之变后一直努力塑造的开明形象受损。《字林西报》评价她：“慈禧太后还是1900年未经审讯就处决六君子的慈禧太后，还是在庚子年参与根除在中国的外国人的

阴谋并将忠于她的大臣处决时的慈禧太后。”<sup>[24]</sup>而对刘鹗来说，其心曲也只有借小说发明一二。

## （二）刘鹗群体对庚子历史的主动言说

刘鹗在因“沈荇案”避地上海之际，为何着手创作《老残游记》？推究刘鹗的本心，多少带有“危机公关”意图，小说的故事情节又与他在庚子年前后的主要遭际有关。

实际上，刘鹗当时颇有争取舆论的需要。前文所述刘鹗、连梦青、吴式钊、沈荇、马建忠等人，构成一个提倡洋务的文人团体。他们不仅政见接近，还因组织“福公司”开发路矿而产生了密切的经济联系。有迹象显示，刘鹗的同人团体在“沈荇案”后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清算，尤其是名誉侵害。

其中吴式钊遭受“污名化”的现象最为严重，因为他被指为出卖沈荇的负心者，社会媒体一片诟骂。这些诟骂很快超出“沈荇案”本身的维度，发展为各种毫无根据的污蔑。略举典型的一例，如章士钊在叙述本案时，将吴式钊描述成文化水平极低的“白字先生”，并谓吴式钊出卖沈荇的原因是沈荇鄙视其文化水平：

式钊虽通籍，作一尺牍终有别字一二枚夹入。荇顾不喜文字，而舌锋之利不减于当年，尝对人而讽式钊之不文，以故式钊衔之刺骨。怨毒之于人甚矣哉！<sup>[25]</sup>

这个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。在“沈荇案”发生前，吴式钊文章、学问都为时人称许，他曾被云南经正书院聘请阅卷，又与许印芳、朱庭珍、赵藩并称“滇南四子”，与赵藩、陈荣昌、朱庭珍合称“滇南四杰”。奇怪的是，“沈荇案”发生后吴式钊突然销声匿迹，以致今天他的名声，完全无法与许印芳、赵藩等人相提并论。

从清末到“改革开放”之前，吴式钊与刘鹗常被斥为“汉奸”，刘鹗组织的各种中外商业行为，则被描述为出卖国权。范伯群评论曰：“刘鹗真是生不逢时，如果他生在今天，那他一定会在改革开放大业中做个开路先锋，还是一位为引进外资大显身手的外贸谈判专家。刘鹗的见解实在太超前了。”<sup>[26]</sup>或许的确是超越时代太多，但无论如何，刘鹗负谤之深，是非常罕见和奇怪的。

刘鹗引进外资的行为究竟有无卖国？事实非常

容易查证。由吴式钊出面与外国财团订立的合同具有，维护国权可谓不遗余力。该合同共19款，处处维护“国家应得余利”，要求“报效中国国家”，并且专款规定，“该矿为中国自主之产，将来中国有与别国战争之时，福公司应听中国命令，不得接济敌国”<sup>[27]</sup>。在《老残游记》第一回的梦境中，刘鹗要求的“西方罗盘”，可以体现为以下两个合同条款：

十一、矿工工头开办之始，自应选用洋人。倘日后华人中有精矿学、谙习工程者，豫丰公司派充此项要职。至其余司事照料等职，无关重大责成者，皆用华人，尤宜多用河南人，以开风气。

十三、福公司于各矿开办之始，即于矿山就办开设矿务铁路学堂，由地方官绅选取青年颖悟学生二三十名，延请洋师教授，以备路矿因材施教，此项经费由福公司筹备。<sup>[28]</sup>

马建忠在1879年写成《铁道论》和《借债以开铁道说》，主张借外债修建铁路，救亡图存。他特地指出，对外借款不必以国家利权作为抵押，只需“得精练监工细为勘估，即持所勘估者以示外洋”<sup>[29]</sup>。“福公司”正是这一思想的实践，其资金主要向英、意两国筹借，意在引入英国势力以遏制俄国的侵略野心；以私营公司而非政府机构出面与外商签约，以免损害国家主权。吴式钊《思痛吟》谓之“合纵商债运深筹，奋臂要鲸长鲸喉”<sup>[30]</sup>，“长鲸”即指俄人为言。

福公司转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，霸占中国路矿权利，恰是“光绪三十四年秋”<sup>[31]</sup>，即刘鹗被捕、流放新疆之后。然而这些明显的事实，却被彻底无视。刘鹗等被描述为“不知道那石头缝里砰出两个东西”<sup>[32]</sup>，遭受粗暴而毫无根据的斥骂。

在这种环境下，刘鹗和身边友人不能不有所辩白。前文已述，他们得罪于清廷的原因，集中在庚子年前后的几个政治事件，所以他们的自白，也围绕庚子年展开。《老残游记》与《邻女语》两书乃是相辅相成、分工互补的关系。相较而言，《邻女语》更集中于庚子年本身，侧重表现具体历史事件。小说前半部的主人公“金坚”以刘鹗为原型，叙述其毁家纾难的行动，这可能是为了唤

取士林清议的支持。刘鹗认为,“此次京师大难,与寻常水旱偏灾不同,平民之受害也轻,而士大夫之受害也重”,“难民可怜,难官更可怜”<sup>[33]</sup>。救援“难官”是他北上的首要目的,这段经历有恩于掌握舆论的官绅群体。而《老残游记》立意更高,所言问题更加普遍,主要谈论解决中国问题的总体思路,但小说中的若干细节,仍是具体针对庚子事变。

无论《邻女语》与《老残游记》,“庚子年”都是全书言说的核心。只有把握住这一核心,才能领会《老残游记》中大量令人费解的情节。本书第十一回的“北拳南革”之论,向来最受诟病,也最难理解。这段文字中,全书主人公老残并未现身,论题的引出也十分突兀。实际上,刘鹗是在为庚子年间自己的政治立场表态。

刘鹗被捕前,曾在日记中透露,自己“庚子年经都察院具奏,面奉谕旨严拿”<sup>[34]</sup>。该年北方发生义和团运动,而南方则有自立军起义,二者时间接近、相互关联。刘鹗欲洗清罪名,就必须说明他与南北两大政治力量的关系。所以刘鹗在小说中同时贬斥“北拳南革”,应视为他对庚子前事的自白,以及对清廷的示好。就作者而言,这段文字意旨明确,并且精准地预设了听众。然而对普通读者来说,由于不掌握前因后果,自然也无从体会作者心曲,只好误认作“信口雌黄”,“老新党头脑不甚清晰之见解”<sup>[35]</sup>。

如果将这段表白与《邻女语》对庚子历史的叙说合并阅读,则刘鹗等人的政治态度与历史表现,均可充分呈现。反过来亦可理解,为何小说初载于《绣像小说》时,编辑将这一部分文字删去,竟引起刘鹗的强烈愤怒——倘若删去这段表态,刘鹗的自辩也就失去了核心。

此外,本书第一回叙述老残的梦境,其中提到文章伯、德慧生两位友人,形象颇似刘鹗同寓的沈荃、吴式钊二友。文章伯倡言“将那几个驾驶的人打死,换上去几个”<sup>[36]</sup>,接近沈荃的激进立场;德慧生附和老残,恰如吴式钊与刘鹗的关系。象征革命演说家的“英雄只管自己敛钱,叫别人流血”<sup>[37]</sup>,而沈荃所参加的唐才常“自立军”,正因为康有为拖延款项而失败。

## 二 《老残游记》的逻辑结构与文体新变

通观本书的研究史,自从鲁迅提出“谴责小说”的概念,《老残游记》就一直和《官场现形记》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《孽海花》齐名并称。一般认为它们均系“故事连缀”式的松散结构,胡适更提出批评:“(四者)皆为《儒林外史》之产儿。其体裁皆为不连属的种种实事勉强牵合而成,合之可至无穷之长,分之可成无数短篇写生小说。此类之书,以体裁论之,实不为全德。”<sup>[38]</sup>

作为文学革命中的经典论述,胡适之言影响极广。然而推究实际,《老残游记》不宜与其他三者等量齐观。如把《老残游记》视为一部“政治自白书”,则不难发现本书逻辑严谨、结构完整,且并非尽由“实事”组成,而是精心调配写实与虚构。这是理解该书主旨的关键,却被一般论者忽视。

在小说观念上,刘鹗接受梁启超为代表的“新小说”运动影响,同时他还试图在文体和思想上,均达成“集大成”的姿态。以上种种,共同造成了《老残游记》独特的艺术形式,尤其是篇章结构。

### (一)《老残游记》的行文框架

近年学界对《老残游记》思想内容、篇章结构的阐释,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。一种以王德威的说法为代表:

一般我们从政治小说的角度来讨论《老残游记》时,往往侧重书中直接明白的议论,而忽略小说的叙述形式或情节布局,亦时有暗示作者政治动机的可能。<sup>[39]</sup>

另一种,可将袁进的说法作为代表:

他对故事情节结构漫不经心,而刻意抒写人物内心的情思,表现出中国小说刻画人物由外部自描向内心心理描绘的转化。<sup>[40]</sup>

后一说在社会上传播更广,更有影响。有趣的是,以上两说的学术渊源,显然都应该上追到夏志清关于本书的论述——“政治小说”和“漫不经心”二语,都来自夏志清《〈老残游记〉新论》的原文。夏氏意在表彰刘鹗对小说艺术形式的革命性创新,他卓有识见地指出:刘鹗“不满前人以情节为中心

的小说，又有野心包揽更高更繁杂的完整性，以与他个人对国计民生的看法互相呼应”<sup>[41]</sup>。然而，夏志清将《老残游记》视为片段式结构，而不是将全书视为整体来讨论。这应当归因于鲁迅以来的研究者的传统观点。

对《老残游记》的解读，是一个学术史遗留问题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该书之所以广受称道，一直是因其优美的文字，而该书的思想内涵一直受到轻视、批评或回避——对本书结构的误解会导致对内容的误读。

鲁迅推重本书，主要因其“叙景状物，时有可观”<sup>[42]</sup>。当时语境下，文章之美确有特殊的社会价值。在白话文提倡之初，社会普遍认为白话文便于理解、宜于说理，但在审美性方面有所欠缺——例如林纾与钱玄同的著名论战中，双方都承认这一前提。而《老残游记》则启示读者，白话也可以写作美文。尤其是该书第二回，前半叙大明湖风光之美，优美不逊于古代山水散文名篇；后半摹白妞说书声音之妙，也高出历代描写音乐的诗文之上。基于这种背景，《老残游记》的第二回也极受提倡白话文学的胡适爱赏<sup>[43]</sup>。后之论者大多沿袭鲁迅、胡适二氏观点，所以王德威总结说：“我们历来推崇《老残游记》的优点，多半是强调其生动的述景叙情方式……像大明湖的湖光水色，隆冬黄河的冰封千里，乃至黑妞白妞的歌喉婉转，都是我们至今犹津津乐道的场景。”<sup>[44]</sup>

至于该书的内容与思想，论者唯表扬其“揭清官之恶”<sup>[45]</sup>的一面。兹论发自刘鹗的夫子自道，小说在《天津日日新闻》发表时，所附刘鹗评语中有此言，后来又经鲁迅、胡适的反复引述，遂而深入人心。至于该书第十一回对“北拳南革”的批评，则一向被视为保守落后。总之，本书盛名之下，难掩知音寥寥。

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刘鹗以高级士人的身份投身小说创作，在创作态度和思想深度上，与李伯元、吴趼人等职业小说家有所不同，其寄托之深、运思之密，均远过之。这种差异性的典型表现，可以举《老残游记》发表过程中，一件著名的公案为例：本书原本在《绣像小说》连载，因编者篡改其文，删去原著第十一回，刘鹗愤而停止供稿。

该事件反映出李伯元与刘鹗对小说结构的不同理解：李伯元将长篇小说视为短篇故事的连缀，删去一二故事亦无伤大雅。虽然樽本照雄认为其时《绣像小说》的编者并非李伯元，但李氏作为该杂志的总负责人，他至少认同编辑有整章删改原作的权力。而刘鹗则将全书看作不可分割的整体，删节会扭曲全书主旨。

阿英、刘德隆等论者早已发现，《老残游记》被删部分，在李伯元《文明小史》第五十九回得到复现<sup>[46]</sup>。这也说明李伯元与刘鹗的分歧，不在于小说的思想内容，而在于两人对小说结构的认识差异。李伯元认为故事情节可以比较随意地剪裁挪用，这也正是一般“谴责小说”松散结构的基础；而刘鹗则认为前后文关系不可改易。

实际上，《老残游记》的章法结构和创作理念，都有别于《官场现形记》式的作品：

第一，完备的整体结构，是《老残游记》与典型“谴责小说”的根本差别。该书以“如何拯救中国”为核心主题，严格遵循“发现问题，在理论层面解决问题，在实践层面解决问题”的逻辑结构展开情节：

(1) 小说第一回，以类似“得胜头回”的形式，用“沉船”寓言对全书进行总括，表述作者对中国问题的总体思考。

(2) 第二回至第七回，是对中国问题的观察。其中第二回首先观察中国的环境基础，认为风土与人情皆美。风土之美的代表为大明湖，人情之美的代表为白妞说书。从第三回开始，对中国的施政治理展开考察，分为省城和州县两个层面，并指出中国最严重的问题，是基层治理不良，尤其是司法审判的粗暴。此部分可以对照开篇“沉船”寓言对“舵工、管帆的、(下等)水手”的批评。

(3) 第八回至第十一回，即申子平夜访桃花山情节，构建“哲学三人谈”，是在理论层面解决中国问题。小说既申明作者对“北拳南革”两大政治力量均不赞成的态度，又从学理高度阐发对中国前景的预计。其中女性形象玛姑与《二集》中的逸云，既是对狭邪小说的模拟，也有哲学化身意味，林语堂说“大概铁翁最喜才识高超、议论风采十足之女子”<sup>[47]</sup>，恐是误读。

(4)第十二回至结尾,是在实践层面解决中国问题。前文既指出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基层治理不善、以刑讯代替司法,则此部分与之呼应,以一个公案的解决,来讨论何为正确的司法。白太守以逻辑推理释冤、老残化身“福尔摩斯”<sup>[48]</sup>调查访凶,是刘鹗推荐的先进经验。至此,全书完成逻辑的回环。小说的线索人物老残,前半部分作为观察者,而后半部分作为实践者。

第二,有意识地组织写实与虚构,是《老残游记》区别于典型“谴责小说”的重要特征。“谴责小说”多用连缀新闻的方式组织情节,而新闻追求真实性,其内容愈真实,谴责就愈有力。《老残游记》则不同,其虚实关系明显经过精心设置。如不计“得胜头回”性质的第一回,可将《老残游记》正集划分成三大结构单元,即:

- (1)老残游历考察济南、曹州府;
- (2)申子平访贤桃花山;
- (3)老残探案齐河县。

显然,第一单元中,无论是对济南风土人情的描写,还是对曹州府酷刑虐政的叙述,都是写实性的;然而第二、第三单元,其主题情节完全出于虚构。本书虚实的界线十分清晰。在写实部分,原书回评反复指出其征实、可信的特点,如云:“将来可资正史采用,小说云乎哉!”<sup>[49]</sup>或曰:“野史者,补正史之缺也。名可托诸子虚,事须征诸实。”<sup>[50]</sup>

而在虚幻部分,刘鹗特意使用某些关键词,来明示其虚构性,以便读者理解。小说第二单元“桃花山夜话”情节,显然在模仿志怪传奇中的狐仙故事。该单元的起始,即小说第八回,初稿原作“桃花山月下遇狐”<sup>[51]</sup>,而定稿则改“狐”为“虎”,避免了过于直露的表达,但“琦姑”的姓氏仍被设置为“涂氏”,即涂山之狐。小说第三单元,又将探案故事的发生地命名为“齐东村”,即“齐东野语”之意。熟悉中国文学传统的读者自能解读这套语码,领会作者的深意。

如果以“谴责小说”理解《老残游记》,则全书后两单元尽为虚构显然很不合理。因为谴责小说旨在“揭发伏藏,显其弊恶”<sup>[52]</sup>,而虚构情节势必大大减弱揭露的力度。与《老残游记》不同,其他三大谴责小说的结构都比较“均匀”,写实与虚

构情节相互错综,全书没有明显的虚、实分野。

## (二)文体创新的思想与文学渊源

本书之所以长期遭受误读,是因为全书思想核心,即第八至十一回,相当复杂难解。正如作者在第十一回评语中所言:“此卷书,凡夫读之亦不能解释、不能信从。”<sup>[53]</sup>一方面,刘鹗出身的太谷学派主张调和三教,其话语糅合《易》理、佛典和道教丹法;另一方面,本书的言说方式也颇特别:黄龙子阐述政治哲学,却先从月球明暗的科学原理说起,长篇大论,令现代读者莫名其妙。必须回到当年的话语环境,方能领会作者的意图。

刘鹗表述的政治思想,沾染了斯宾塞学说色彩。英国思想家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《群学肄言》出版于1873年,严复在1897年译出该书前两章,刊于《国闻报》;1902年译成全书并于1903年4月出版,同年《老残游记》发表。刘鹗和《国闻报》关系甚深,必然阅读过这部著作。斯宾塞主义在近代中国影响极大,而刘鹗是最早接受其影响的思想家之一。

无论形式与内容,《老残游记》都取法于斯宾塞。《群学肄言》第一章“砭愚”,在阐述学理之前,先大段论述太阳黑子的科学原理,然后引入“观人察事”;由“格物”之学进而“谋国议政”,即所谓“格致不明,无以与于治平之理”<sup>[54]</sup>。刘鹗显然效法了斯宾塞这一行文技巧,同样由月球绕地的天文学知识导入对人事的评判。小说第十一回是全书最核心的篇章,刘鹗在本回集中表述其政治思想。他借黄龙子之口预言中国未来,乃是对斯宾塞“用科学之律令,察民群之变端,以明既往、测方来”<sup>[55]</sup>的模拟。《老残游记二集》中也提到,黄龙子师兄弟“有前知”,但不靠算命先生的“术数小道”<sup>[56]</sup>。换言之,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才是其预言历史进程的依据。

在此基础上,小说结合刘鹗对中国现实的理解,形成完整思考。老残的游历,始于考察济南自然、人文环境,发现二者皆美。这一观点在《老残游记外集》残稿中得到明确表述:“中国有四长,皆甲于全球:廿三行省全在温带,是天时第一;山川之孕蓄,田原之腴厚,各省皆然,是地理第一;野人之勤劳耐苦,君子之聪明颖异,是人质第一;文、周、孔、孟之书,圣祖、世宗之训,是政教第

一；理应执全球的牛耳才是。”<sup>[57]</sup>既然如此，中国的困局只能归因于治理不善。刘鹗对基层治理的批评也在《老残游记二集》中延续，如云：

官幕两途，牛鬼蛇神，无所不有，比那下等还要粗暴些！<sup>[58]</sup>

可知那州县老爷们比娼妓还要下贱！<sup>[59]</sup>

好好的一个人，怎样做了知县就把天良丧到这步田地！<sup>[60]</sup>

以上思想承载于小说文体，《老残游记》最明显的特点是融多种小说类型为一炉：全书每一个结构单元，都是一种当时社会比较流行的小说类型。

随着近代知识界视野的扩展，中国作家开始接触到西方科学的归纳分析思维方法，并予以应用于小说。所谓“泰西事事物物，各有本名，分门别类，不苟假借，即以小说而论，各有体裁，各有别名”<sup>[61]</sup>，是当时小说理论界的共识。在中西比较中，理论家普遍认识到“我国小说，虽列专家，然其门类，太形狭隘”<sup>[62]</sup>，并得出“西洋小说分类甚细，中国则不然，仅可约举为英雄、儿女、鬼神三大派”<sup>[63]</sup>，或“综其大较，不出海淫、海盗两端”<sup>[64]</sup>的结论，进而必然会产生相应的文体改良主张，即：“外人之可以为历史、政治、种族与种种小说者，吾中国何不可以为历史、政治、种族与种种诸小说？”<sup>[65]</sup>

循此思路，从梁启超在《中国唯一之文学报〈新小说〉》中，将小说分为“历史小说、政治小说、哲理科学小说、军事小说、冒险小说、侦探小说、写情小说、语怪小说、札记体小说、传奇体小说”十大门类开始<sup>[66]</sup>，晚清小说形成了标明门类的习惯。《新小说》杂志即按梁启超的分类标目，后来出版的其他杂志和单行本亦纷纷仿效，以致樽本照雄《清末民初小说目录》统计的翻译小说、创作小说类别，数量都很庞大。而《老残游记》的特别之处，则在于刘鹗试图将当时最重要的几种小说类型，包罗在一书之内。

袁进认为：“谴责、政治、公案、侦探各类小说，都是晚清最流行的小说。以一部小说而综括上述诸种小说形式，在晚清小说中，《老残游记》是罕见的，但它们超出了作者的驾驭能力，显得不相协调。如以侦探故事终结全书，破坏了游记体裁的完整性。”<sup>[67]</sup>实际上，《老残游记》综括的小说

类别，不只袁氏列举的几种。书中几处男女夜话场面，有非常明显的狭邪小说色彩；“桃花山逢虎”情节，则接近当时流行的探险小说。

刘鹗似乎希望将社会上流行的小说尽量容纳，同时他又注意采纳梁启超对小说的理论阐释。例如，梁启超《中国唯一之文学报〈新小说〉》的小说分类中，“哲理科学小说”十分特殊，是将两个门类合为一体。该类别“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，其取材皆出于译本”<sup>[68]</sup>，梁氏举出的范例，以法国科幻大师凡尔纳的作品为代表。而《老残游记》开篇“自叙”在阐发思想时，引述“博物家”的动物学知识；第一回的政治寓言中，又提到空气折射阳光的现象；特别是山中一夜的哲学三人谈，讲解了地球自转、空谷传声等科学原理。此笔法显然是对凡尔纳硬核科幻小说的模仿，令《老残游记》近似于凡尔纳的“奇异旅行”（Voyages extraordinaires）。

《老残游记》的奇特结构，制造了一种文备众体的“集大成”姿态，暗合“通百家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的中国立言传统，从中不难规见作者的野心。诚如吕侠人所谓：“使孔子生于今日，吾知其必不作《春秋》，必作一最良之小说，以鞭辟人类也。不宁惟是，使周秦诸子而悉生于今日，吾知其必不垂空言以诏后之人，而咸当本其学术，作一小说以播其思想，殖其势力于社会，断可知也。”<sup>[69]</sup>

当然，在刘鹗笔下，不同的小说类别，地位亦不相同。定一《小说丛话》批评中国本土小说不发达，认为：“补救之方，必自输入政治小说、侦探小说、科学小说始。盖中国小说中，全无此三者性质，而此三者，尤为小说全体之关键也。”<sup>[70]</sup>而对刘鹗来说，他所重视的也不外这三大门类：《老残游记》讨论政治问题；包含哲学与科学思想；同时由于刘鹗认为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司法黑暗、基层治理不良，所以侦探也特别受他重视。本书第十二回以后，基本是侠义公案小说与刚刚传入的侦探小说合流，特别是最后二回，接近纯正的侦探小说。

此种写法明显打破了雅俗文学的界限，将小说拨入原本由“诗古文辞”占据的雅文学领域。尤其难能可贵的是，刘鹗有意识地“化俗为雅”。为此他在《老残游记二集》中引用《道德经》和佛家“色空”观念，为自己提供理论支撑，并借黄龙子之口宣

布：“我也知道俗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雅，雅有怎么好处？……我辈大半愚鄙，不像你们名士，把个‘俗’字当做毒药，把个‘雅’字当作珍宝。”<sup>[71]</sup>

具体而言，刘鹗参用经典的古文笔法写景叙事，模拟山水游记散文，并特在第三回评语中指出：“第二卷前半可当《大明湖记》读，此卷前半可当《济南名泉记》读。”<sup>[72]</sup>这正是《老残游记》超越流俗之处：自《海上花列传》以降，近代狭邪、谴责两大小说门类，往往刻意模仿《儒林外史》片段式的结构；刘鹗却独辟蹊径，转而借鉴《儒林外史》的文笔。他描绘济南风光，可以比美《儒林外史》第二十四回对南京的叙写，因此深受鲁迅、胡适等新文学家的赞许。

## 结 语

长期以来，学界对《老残游记》思想内容、篇章结构的阐释，一直存在较大分歧——这虽不符合其文学史地位，却恰可代表近代文学有别于其他时段的特质：该时段的作者，对小说文体的理解处于古今中外之间，其作品也斟酌东西、个性鲜明。

包括鲁迅本人在内，论者普遍注意到《官场现形记》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与《老残游记》《孽海花》之间明显的差异：前者更符合“谴责小说”的典型定义，而后者则在结构复杂性上明显胜出，并在艺术水准上高出一筹<sup>[73]</sup>。至于本文所论，则希望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，通过寻根导源，来重新定位《老残游记》这部名著：一起突如其来的政治事件，导致刘鹗陷入危机，不得不为己辩白。他选择时会所钟的小说文体表述政见，以集大成的姿态对“中国问题”做了系统论述，这才是《老残游记》的真正主题。

[1][51] 刘德隆：《刘鹗散论》，第49页，第72页，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。

[2][42][52] 鲁迅：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第186页，第186页，第181页，中华书局2016年版。

[3][11] 刘大绅：《关于〈老残游记〉》，《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》，刘德隆等编，第391页，第392页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。

[4] 参见张海荣《多重视角看“沈荃之死”》，《北大史学》2012年号。

[5] 蔡铁鹰：《〈源委〉的真与伪：〈老残游记〉成书“资助说”质疑——兼论〈邻女语〉作者当为刘鹗》，《淮阴师专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1991年第3期。

[6] 《清通鉴》，戴逸主编，第8739页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。

[7] 参见王照《记余投狱事》，《雪泥一印草删存》，第492—493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。

[8][13][30] 国家图书馆藏有一个题为《思痛吟》的抄本，系吴式钊创作的七言长诗体自传，其中详述其下狱和平反经过。因吴式钊的诗集《强静斋诗录》编印较早，故该诗未经收录，仅在北京文友间传抄。国图抄本落款光绪辛丑（1901），即案发之前两年。参见吴式钊《思痛吟》，抄本，索书号28903，国家图书馆藏。

[9] 李鸿章：《李鸿章全集》，第7195页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。

[10] 马忠文：《晚清人物与史事》，第316页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。

[12] 夏仁虎：《旧京琐记》，第115页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。

[14][33] 刘鹗：《致陆树藩四封》，《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》，刘德隆等编，第295页，第296页。

[15] 参见冯志阳《华洋官绅之间：以救济善会的活动为主》，《庚子救援研究》，第227—279页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。

[16] 参见罗振玉《雪堂自述》，第108页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。

[17][19][34] 刘鹗：《戊申日记》，《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》，刘德隆等编，第276页，第277页，第276页。

[18] 狄宝贤：《平等阁笔记》，第88页，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。

[20] 周轩：《刘鹗在新疆的最后一封信》，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1997年第1期。

[21] 《摄政王宽免公罪》，《大公报》第2431号，1909年4月29日。

[22] 此说出自《新纂云南通志》，系“采访”传闻而来。参见民国《新纂云南通志》卷二百三十四《文苑传》三，页十四a—页十四b。

[23] 刘大杰《刘铁云轶事》曾描述一位隐去姓名的神秘老

者，事与吴式钊略似。然该老者为四川人，戊戌到庚子年曾与刘鹗同寓，而吴为云南人，辛丑年方与刘鹗同寓。或许老者另有其人，抑或许刘大杰为了保护当事人隐私，故意改动了身份信息。见《老残游记资料》，魏绍昌编，第122—126页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。

[24]《字林西报》1903年8月11日，转引自王敏《苏报案研究》，第119页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。

[25]章士钊：《章士钊全集》第一卷，第134页，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。

[26]范伯群：《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》，第214页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。

[27][28]《河南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邑矿产章程》，转引自《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（河南卷）》，第2页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。

[29]《马建忠集》，王梦珂点校，第29页，中华书局2013年版。

[31]《福公司盗采河南怀庆煤矿之历史》，《民呼日报》1909年7月5日，转引自《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（河南卷）》，第3页。

[32]《留日河南同乡会警告河南同胞速办矿务书》，转引自《河南冶金志资料汇编（近代冶金工业）》，河南省冶金建材工业厅冶金志编辑室编，第202页，内部资料1987年版。

[35]钱玄同：《寄陈独秀》，《文学运动史料选》第1册，北京大学等主编，第30页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。

[36][37][45][48][49][50][53][56][57][58][59][60][71][72]刘鹗：《老残游记》，第5页，第7页，第129页，第146页，第31页，第104页，第87页，第169页，第246页，第178页，第179页，第203页，第168页，第23页，上海书店1993年版。

[38]胡适：《胡适文存》第1集，第32页，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。

[39][44]王德威：《想象中国的方法：历史·小说·叙事》，第63页，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。

[40][67]袁进：《试论上海近代文学创作的繁荣与意义》，《史料与阐释》贰零壹贰卷合刊本，第205页，第206页，

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。

[41]夏志清：《〈老残游记〉新论》，《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》，刘德隆等编，第477页。

[43]胡适：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，《胡适文存》第2集，第207—208页，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。

[46]阿英：《〈文明小史〉叙引》，《小说四谈》，第154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；刘德隆：《〈老残游记〉手稿管见》，《文学遗产》1989年第3期。

[47]林语堂：《良友版（老残游记）二集序》，《老残游记资料》，魏绍昌编，第218页。

[54]斯宾塞：《群学肄言》，严复译，第4—9页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。

[55]严复：《译群学肄言序》，斯宾塞：《群学肄言》，严复译，第7页。

[61]紫英：《新庵谐译》，《月月小说》第1卷第5号，1907年2月。

[62]俞明震：《觚庵漫笔》，《小说林》第7期，1907年12月。

[63][69]侠人：《小说丛话》，《新小说》第2年第1号，1905年2月。

[64]任公：《译印政治小说序》，《清议报》第一册，1898年12月。

[65]世：《小说风尚之进步以翻译说部为风气之先》，《中外小说林》第2年第4期，1908年2月。

[66][68]梁启超：《中国唯一之文学报〈新小说〉》，《新民丛报》，1902年7月15日。

[70]定一：《小说丛话》，《新小说》第2年第3号，1905年4月。

[73]参见胡全章《晚清新小说类型研究述评》，《中国近代文学研究：中国近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》，刘琦、杨萍主编，第34页，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；陈平原《鲁迅的小说类型研究》，《陈平原小说史论集》，第1393页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。

[作者单位：河南大学文学院]

责任编辑：马勤勤